

从格雷马斯叙事语法分析电影《暴裂无声》

刘明华

(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影视科研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2017年上映的由忻钰坤导演主导的国产犯罪悬疑电影《暴裂无声》受到了大众瞩目,相较于成为商业电影成功案例的前部作品《心迷宫》,《暴裂无声》转向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影片从三组家庭入手,进行多线性的叙事,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对悬念的层层设置,甚至在影片结尾形成了开放式结局,大大吸引了观影者的注意力,引导其对现实人生进行深刻思考。《暴裂无声》为大众展现了独特的结构主义叙事方法,本文主要运用格雷马斯叙事语法对影片中关于人性的争议、思考进行探析,梳理人物关系,探寻到影片的内涵。

【关键词】格雷马斯叙事语法;分析;《暴裂无声》

电影《暴裂无声》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真实的社会新闻,影片从一个孩子在牧羊过程中离奇失踪展开叙述,其父亲张保民在不断寻找儿子的过程中探寻到孩子的失踪案与煤老板昌万年有关。张保民帮助徐文杰律师救活了其女儿,然而徐文杰却是昌万年的帮凶,在知晓张磊失踪原因的情况下面对警察的询问选择失语。两起儿童失踪案将三个不同阶级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对人间冷暖、人性进行讲述。影片始终贯彻“无声”,张保民的不能说、徐文杰的不敢说、昌万年的不敢说对中国当代的社会面貌进行揭露,发人深省。

一、结构中构成的人性博弈

《暴裂无声》影片的叙事结构从剧情到人物关系的设置上都比较清晰,并没有沿袭前作《心迷宫》在叙事上追求悬念的层层渐进^[1]。影片通过两个孩子的失踪将三个不同阶级、性格迥异的人物联系起来,在叙述中结构出影片的深层含义,也就是人性的博弈。三个不同阶级的人物,失语矿工张保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帮凶徐文杰律师处于社会的中层,煤老板昌万年则是顶层富人的代表。导演利用失踪案使其产生交集,形成影片的独特结构。底层人士对社会的暴力反抗,作为法律使者的律师的失德与包庇、顶层商人的贪婪冷漠,将现实社会中的丑恶进行无线的放大。

格雷马斯叙事结构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对立进行梳理,使得各要素关系之间的深层结构更加明晰,基于此,才能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结构,掌握内涵。《暴裂无声》三个人不同的找寻目的形成了对立,构建了戏剧矛盾。张保民和徐文杰找孩子受到父爱本能的驱使,是人性的正面;昌万年则是抱着要挟徐文杰的目的寻找孩子,表现出的是人性的反面。张保民意外帮助徐文杰救下了女儿,却没想到徐文杰成为昌万年的帮凶,两位父亲之间又产生了戏剧性的矛盾。多重的线性叙事结构通过人物关系之间的不断对立揭露真相,令人震撼。

二、二元对立下的符号矩阵

格雷马斯吸收借鉴了众多结构主义学家的理论,结合自身对于结构意义的探讨与深入挖掘形成了独特的符号矩阵。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包含着四项内容,分别是X、反X,非X、非反X。四者之间相互对立,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

《暴裂无声》影片的叙述结构能够通过格雷马斯的二元对立下的符号矩阵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影片围绕着人性中的善恶、正义展开叙述,有着深沉父爱的张保民与昌万年之间展开正义之争,正体现出X与反X的对立^[2]。而昌万年的帮凶徐文杰与谷丰村的村民则构成了非反X与反X的对立,两者之间又与反X产生联系。其人物关系主要如下。

(一) X——张保民(正义)

影片围绕着张保民寻找儿子进行展开,张保民不仅是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更是符号矩阵中的主体。张保民虽然作为社会的底层,但是在自己儿子找寻未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奋不顾身的救助徐文杰的女儿,展现出人性的光辉,表现出人物的善良本性,成为正义的代表。

(二) 反X——昌万年(反正义)

与正义一方相对的,显示以昌万年为首的邪恶势力。张保民与徐文杰孩子的失踪与昌万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昌万年与其手下常年从事非法采矿的地下交易,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面对张保民对找寻儿子的坚持不懈,昌万年选择挟持孩子对徐文杰进行威胁,帮助自己脱罪。此外,昌万年对手下冷漠对待,为了一己私利视他人生命如草芥,体现出其反正义的特征。

(三) 非X——谷丰村村民(非正义)

谷丰村的村民为了一己私利,摒弃了正义道德强迫张保民在征用书上签字,村长更是为了谋取利益选择出卖张保民,将其行踪随时向昌万年进行汇报,这种行为属于非正义行为。

(四) 非反X——徐文杰(非反正义)

律师是为百姓声张正义的职业,是法律的代言人,然而徐文杰身为一名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昌万年进行交易^[3]。不仅隐瞒了昌万年非法采矿的事实,还成为昌万年杀人埋尸的帮凶。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与利益,即使张保民救下了自己的女儿,仍然选择对事实真相缄口不言,知法犯法。

三、叙事结构里的行动元模式

格雷马斯认为叙事通常由外显叙述与内隐叙述共同组成,通过展现行动元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主客体的关系模型。基于此,形成了三组二元对立关系,分别是主、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以及辅助者与反对者。

《暴裂无声》影片便是通过内外双层含义形成行动元,揭露现实。影片中四个群体,其中三类是围绕着昌万年开展活动,因此,昌万年可以看作是行动主体,进行利益的发送。而昌万年对于人命的漠视、非法利益的看重等反正义的行为成为输送客体,影响着接受者徐文杰的思想,使其知法犯法。另外,谷丰村村民受到利益的驱使成为昌万年的辅助者,对正义行为进行迫害,助长反正义行为的发生。张保民在影片中,不仅对人性善恶、正义进行维护,更对个人非法利益进行反对。在面对人性残酷的考验中,他始终保持善良的本性,坚持正义,与邪恶势力进行抗争,是利益的反对者。

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的叙事结构中,三组对立关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推动情节的开展,具有逻辑关系。

结论

综上所述,《暴裂无声》影片中对于人性善恶的深层叙述,通过格雷马斯叙事语法可以对其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进行双重解读,有利于挖掘影片的深层含义,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 [1] 卫红梅. 从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浅析影片《归来》的结构[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 35(12).
- [2] 杨由之. 格雷马斯叙事语法中的女性人物——以电视剧《红高粱》为例[J]. 视听, 2016, No. 107(03).
- [3] 姜奕村. 格雷马斯叙事符号学视野下的话语深层层面研究[J]. 科技信息, 2011(18).